

朱启钤的丝绣收藏

崔建利



▲朱启钤六十岁照

朱启钤在建筑学界尤其在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如雷贯耳，他创办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吸纳了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一批近代建筑人才，21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不仅保存了学社成员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勘测和研究成果，也展示出朱启钤为维持学社运营与发展所做的种种努力。

朱启钤的丝绣收藏与研究成就同样出色。

源于生活的灵感与兴趣

朱启钤4岁时，便随母在外公傅寿彤家生活，外公傅寿彤出身，官至河南布政使，家富收藏，“法书、名画之襍，多为宋锦刻丝”，朱启钤“爱其雅丽工緻，眩然莫忘”，母亲知书达理，擅长女红，时常利用零丝锦缝制一些工艺品，“斗锦之智，穿纱之巧，手泽所存，历历至今如在心目”（朱启钤《存素堂丝绣录·弁言》）。这段经历为其成年后的丝绣收藏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成家后，朱启钤放弃举业，入三姨父瞿鸿禨四川学政幕。庚子事变后，瞿鸿禨受清廷重用成为军机大臣，朱启钤随调入京，先后供职于路矿总局、京师译学馆。其间，朱启钤认识了徐世昌，成为徐世昌任民政部尚书、邮传部尚书乃至民国大总统期间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当政期间，朱启钤任交通部长、内务总长等职，其间曾创建古物陈列所，将沈阳故宫及热河（承德）离宫皇家珍藏运至故宫集中管理，组织紫禁城三大殿的重修与装饰、北京旧城改造等工程施工。

这些经历不仅为朱启钤研究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技艺提供了实践机会，也为其丝绣收藏与研究奠定了物质和人脉基础。

朱家缙丝甲天下

朱启钤丝绣收藏始于其履京城以后。其《存素堂丝绣录·弁言》曰：“通籍北来，每于部门荷包巷及庙市摊，采集锦绣刻丝衣饰，改作屏障帖落。朋好知余嗜此，往往举以投赠；估人有得，即持来求售。”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从恭亲王府流出的部分丝绣珍品辗转为朱启钤收藏，如南宋缙丝珍品《牡丹图》团扇等，大大提升了其丝绣藏品质量。

朱启钤的丝绣收藏主要包括缙丝和刺绣，尤以缙丝著称，被誉为“中国缙丝收藏第一人”。沈能毅在《缙丝锦绣论》中说：“朱桂莘先生生平最好缙丝，先后搜集古今作品数千件。”朱氏所藏缙丝不仅数量多，而且品位高，享有“朱家缙丝甲天下”之美誉。

缙丝又称“刻丝”“克丝”，起源于西汉至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唐代始传入中原，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织物之一，存世作品极为稀少。

缙丝织制方法在我国古籍中多有记载，宋人庄绰《鸡肋篇》云：“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线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这段文字描绘出缙丝在织作方式上的鲜明特点是“通经断纬”，即以本色丝作经，各色彩丝为纬，经丝纵向贯穿织物，纬丝仅于图案花纹需要处与经丝交织，但不贯通全幅，用多把小梭子按图案色彩分别挖织，图案轮廓、色阶变换处呈现出断层，看起来像用小刀刻过，所以称为“刻丝”。

从外观看，缙丝与刺绣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缙丝图案成品两面完全一样，均可用为正面，刺绣则不可；缙丝图案与底料是一体的，故图案平整，而刺绣是在底料基础上另加丝线二次创作的，故图案凸起。缙丝因织造工艺烦琐，费时费工，成本高，有“一寸缙丝一寸金”之说，号称“织中之圣”。

20世纪20年代后期，因国内战乱，朱家收入大大减少，生活几近入不敷出，朱启钤便从其丝绣藏品中挑选出宋、元、明、清历代缙丝刺绣珍品70余种100多件，以20万大洋售予时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条件是不得卖给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1930年朱启钤曾在其家庭账册《存素堂账目》上写道：“故民国十八年度为吾家最窘之境……在此罗掘无聊之际，忽有一意外援助，即张汉卿

以20万元收买我家收藏之缙丝书画，归诸奉天博物院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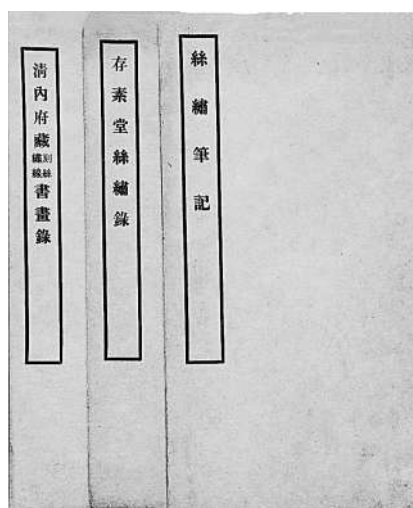
张作霖生前与朱启钤均曾为徐世昌老部下，二人系旧交；朱启钤次子朱海北时任张学良侍从副官，四女朱津筠为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贴身秘书，六女朱洛筠适张学良胞弟张学铭……无论从亲戚层面还是就这批丝绣藏品价值而言，张学良均不敢大意，遂将文物保存在其东北边业银行金库中。

九一八事变后，这批文物随边业银行一起落入日本人手中，朱启钤托其在东北工作时结识的盟弟、时任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的荣厚以伪满名义将这批丝绣宣布为“国宝”，储藏于沈阳正金银行金库，后从中选出部分精品以彩色图版影印成《纂组萃华》用作宣传。

解放战争开始后，朱启钤担心这批文物毁于战火，便趁宋美龄赴东北路过北平之际，当面请宋美龄想法保护。宋美龄在东北看了这批丝绣珍品后认为价值重大，便设法将文物空运至北平中央银行保存，后转存于故宫博物院。新中国成立后，这批文物又移交辽宁省博物馆。

除上述售出珍品外，朱启钤还有部分丝绣藏品留作作家或自用者，多为祖传、友情馈赠或零购小件藏品，均记录在其文物账册中。其中有锦绣裁料56种，缙丝绣画21种（其中《乾隆如皋贴绒册》二本与辽宁博物馆所存为同一复本），礼品类中的绣品20种。

朱家这些藏品并非总是束之高阁，有的被用作孩子们的游戏服装或道具，有的被用来点缀家具，如宋缙丝红色紫薇花石一幅，“装穿衣镜背面”，有的则被作为礼品赠送亲友。抗日战争后期，民众生活艰难，朱启钤曾出售部分家藏文物以贴补生活，其中就有几件丝绣藏品，如乾隆缙金黄库锦一匹，梅花朵，“三十四年售出，得价二千元”。



▲朱启钤部分著作书影

朱启钤的丝绣研究成就

朱启钤好友阎锴曾在《丝绣笔记》跋语中写道：“刻丝绣线固是女红，而典章制度所关更巨。推而至于舆服仪卫及工匠禁令，无一不与国史相关。”这段话道出了朱启钤丝绣收藏的真正目的，即通过收藏目睹相关文物来探究或还原中国古代丝绣工艺及其发展历程，“俾绝艺复兴，古法不坠”（《存素堂丝绣录·弁言》）。

正是依靠丰富的丝绣收藏实践，朱启钤撰写出五部丝绣系列研究著作，即《存素堂丝绣录》《清内府藏刻丝书画录》《清内府藏绣线书画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存素堂丝绣录》是朱启钤对私藏珍贵刻丝、刺绣文物的著录。平时每得一物，朱氏都会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其历史、工艺特征及收藏历程，“随笔札记”“以备印证”。

《清内府藏刻丝书画录》（附《清内府藏绣线书画录》）一书则是朱启钤对公藏珍贵刻丝、绣线书画文物的著录，将当时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藏刻丝及绣线分别按法书、释道图像、花鸟、花卉、翎毛、人物、山水七类加以介绍，“诸录所记，实物俱在”。《丝绣录》及《书画录》对世人了解中国古代丝绣发展历程及各自工艺特点极有帮助，近人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称此书“材料丰富，体例谨严，实为研究我国刺绣史所必读”。

如果说《丝绣录》《书画录》偏重从法式角度展示中国历代丝绣史暨工艺特色的话，《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则是从文献角度对中国历代丝绣史的梳理。

《女红传征略》系朱启钤专为中国古代杰出女红人物整理的传记，全书从历代史书及各类文献中辑录“古今女红家之有名物事实可记者，百有余人”，分织作、刺绣、针工、杂作四类人物进行传述，可谓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女红杰出人物合传。

《丝绣笔记》主要辑录古代文献中与丝绣相关之典章制度、遗文逸事，“以长编之体裁，仿札记之例”编撰而成。全书分两卷，上卷“纪闻”，记述历代丝绣起源、工艺、官匠制度之变迁；下卷“辨物”，记录历代丝绣实物及私家丝绣书画题跋等，两卷均以缙绣、刻丝、刺绣等分类，点面结合，对中国历代丝绣工艺发展及典故逸闻进行了多角度展示，是中国丝绣研究者必备之工具书。

【作者为聊城大学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徐世昌图书收藏及出版研究”（22BQ014）相关成果】

一枚珍贵的“扩红突击运动竞赛奖章”

钟同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西省瑞金县九堡珠斗村发现一枚苏区时期的“扩红突击运动竞赛奖章”，目前收藏于瑞金市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中。

苏区时期，珠斗村有1300余人，经动员参加革命的有300多人，牺牲的革命烈士中有有名有姓的92人，苏区老干部和失散红军39人。山下苏维埃埃政府就驻扎在珠斗村竹山下，该村当时还有少共、赤卫队、洗衣队、儿童团等组织，村民参军参战、打土豪、分田地、做草鞋支援前线的事迹更是数不胜数。

在1933年9月27日的《红色中华》三版的中心位置，登有一短讯《准备了七百担谷子》：“瑞金九堡山下，在经济建设公债没有下发以前，就有许多革命群众，聚集了七百多担谷子，送区苏，首先登记，准备购买经济建设公债。”

在1934年5月28日《红色中华》第二版发有一篇《一鸣惊人，瑞京县首先胜利》的文章，其中有一节《惊人的九堡区群众的积极性》，文章写道：

“这里，要特别称赞九堡区群众加入红军的热忱。在五月二十三号以前，九堡区就已经动员了全区二百六十多名模范赤少队加入红军了。该区的领导机关为要动员更多的数目到红军中去，所以，二十四号特派突击队抓紧山下、坝溪二乡，去编制新的模范赤少队，以便以后来动员，突击队到了该两乡以后首先个别地去找赤少队中的积极分子解释，结果，这些干部都说：‘不用编，我们也愿同模范赤少队一样除老弱或有病的以外全体加入红军。’于是我们的突击队，便抓紧了这种热忱去积极地动员，所以后来在干部会议上各干部便都一致地报名加入了红军。在这些干部报了名以后，又动员这些干部去鼓动队员加入红军。后来开队员大会时百分之九十五的队员便都加入红军了。山下、坝溪二乡得到了这样光荣的成绩以后，区委便立即通知了其他各乡，其他各乡也立刻照着这个样子动员起来，于是便形成了全区赤少队上前线的热潮，其后虽然有些反革命起来活动，企图破坏这一热潮，但却被该区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很快地镇压下去了。在二十六日这一天九堡区全体赤少队三百六十多人便完全集中到县了。”

扩大红军工作，是苏维埃政府最基本、最经常的工作任务之一。苏区创建初期，扩大红军主要是通过建立和扩大地方革命武装，再将地方革命武装升编加入主力红军的形式。与此同时，主力红军也常常直接从地方招募革命青年和青壮男子加入红军，使部队得到扩充。

王立娇是瑞金九堡区妇女委员，九堡区山下乡人，今珠斗村人。她在首届苏区“扩红”工作中突出成绩，多次受到上级嘉奖，其“扩红”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她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革命热情高，工作积极，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特别是在“扩红”中发挥模范作用，在九堡区掀起了当红军光荣的热潮。

她在宣传动员“扩红”工作中，能够联系苏区群众在土地革命前后截然不同的境况，充分讲清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的重大意义，讲清参加红军是每个苏区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激发广大翻身作主人的农民参加红军的革命热情。王立娇还组织了“扩红”宣传队，深入田间地头、工厂作坊、街道圩场、屋场家庭，采取口



头演讲、化装演讲、戏剧歌舞表演和标语、传单、漫画、墙报、黑板报等形式，进行宣传发动。

王立娇在动员劳苦大众积极参加红军的时候，一口气能够把许多话编成顺口溜：

十句讲来句句真，句句讲来鼓动人；大家同志留心听，希望大家当红军。希望大家当红军，讲起红军就惊人；推翻反动国民党，消灭地主与豪绅。消灭地主与豪绅，领导工农来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起义把田分。努力扩大铁红军，全体动员莫留停；大家热烈前方去，争先恐后当红军。……

通过顺口溜，王立娇把穷人为什么要当红军，当红军有什么优惠政策，讲得头头是道，群众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932年春节后，珠斗村准备在布头祠堂举行“扩红”动员大会，九堡区妇女委员王立娇、山下乡妇女指导员杨发娣都动员了自己的爱人参加红军。为了在动员会上取得更好的带动效果，王立娇与刚刚结婚不久的爱人钟同福经过几天商量策划，决定在会上表演夫妻对唱。演唱完毕，动员大会达到了高潮，王立娇的丈夫钟同福和杨发娣的丈夫钟清清当即报名参加红军。在他们的带动下，当天珠斗村就有4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加红军，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子、妻送夫、父子一起当红军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1934年8月13日的《红色中华》第二版重要位置，刊发了时任九堡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九堡游击队司令钟达山写的报道《瑞金九堡区要做全县的模范》。报道称，红军家属积极领导——山下乡的红军家属在秋收借谷中起了很大的领导作用，如红属妇女王立娇同志借谷子六十五担，钟祥云同志借谷子十担，钟同福同志借谷三十五担等光荣例子在该乡各种会议上，都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热情，所以他们能在两天内完成并超过四百担的原定计划。

1933年8月，王立娇在扩红突击竞赛中表现优异，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竞赛二等奖章。被他们家珍藏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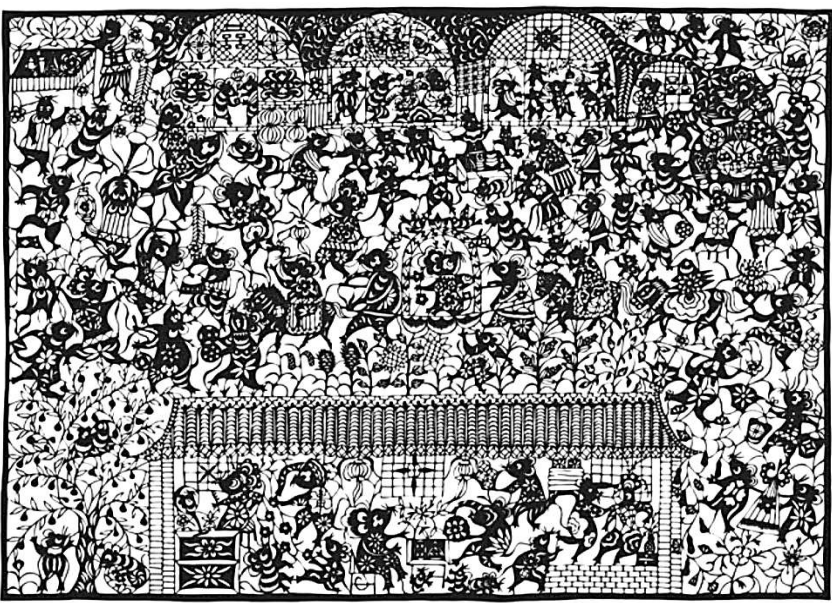
“扩红”期间，王立娇在九堡区为红军部队输送了几百名战士。她的丈夫钟同福于1934年10月随军北上后牺牲。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后，王立娇被国民党抓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王立娇立场坚定，同年12月被杀害在珠斗村干坑拱桥窝，和她一起遇害的还有杨发娣。

这枚五角星的扩红竞赛二等奖章的光亮已经黯淡，雕刻的字体也有些磨损，甚至有了锈斑，但是，奖章仍然闪闪发光。

剪纸《老鼠娶亲》

赵振宇



《老鼠娶亲》（剪纸） 55.5×75.5cm 2008年 华月秀 作

“老鼠娶亲”是中国北方广泛流传的民俗故事。相传，正月初三（时间各地有所不同）晚上是老鼠娶亲的日子。为了不打扰老鼠，人们会在当天晚上尽量提早就寝，并在老鼠经常出没的角落撒米、盐和糕饼，通过与老鼠共享一年来的收成来庆祝老鼠新婚，表达与老鼠打好交道以减少来年鼠害的美好愿望。

“老鼠娶亲”为民间艺术创作提供了灵感源泉，在曲艺、歌谣、剪纸、年画、刺绣等艺术形式中均有表现。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华月秀创作的剪纸作品《老鼠娶亲》便是其中之一。

该作品分为下部“嫁女”、中部“迎亲”、上部“迎回”三部分，井然有序、杂而不乱，将“老鼠娶亲”的民俗故事与陕北农村婚俗巧妙结合起来。

作品下部表现鼠新娘从娘家出嫁的场景。宽敞明亮的瓦房中，从左至右

分别是鼠新娘对镜梳妆打扮、娘家接受彩礼和糕点、为鼠新娘“开脸”（即去除面部的汗毛、剪齐鬓发和鬓角的仪式）的场景。

作品中表现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众多老鼠打着彩旗、提着灯笼、举着鞭炮，敲锣打鼓地护送着骑马的鼠新郎和坐着花轿的鼠新娘。挑着嫁妆的几只老鼠走在队伍。

作品上部表现的是将新娘迎至婆家窑洞后的场景。从左至右分别是人洞房、“并头”仪式（新郎和新娘背靠背坐着，亲人边唱歌边将二人头发梳拢到一起，表达对新婚夫妇的祝愿）和闹洞房的情景。窑洞外从右至左则是盛大的喜宴和“站大小”仪式（即新郎和新娘给家族中的老小磕头认亲）。

作者刻画了几十只生动活泼、形态各异的老鼠形象，既富于动物的原型特色，又充满浓厚的人情味。老鼠身上饰以各种植物图案，画面的间隙也以各式花草树木的纹样穿插，使整体画面饱满而又轻盈。整幅作品内涵丰富、构思巧妙，是兼具艺术性和趣味性的佳作。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馆）

清光绪青花婴戏图碗

付裕



青花婴戏图碗，清光绪，高7.4厘米，口径15.5厘米，足径5.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藏清光绪青花婴戏图碗敞口、弧腹，圈足。外壁以青花装饰，发色灰蓝，口沿和足墙各有青花

双环线一周。外底有青花“大清光绪年制”六字楷书款。

碗外壁绘两组婴戏图，两组图间以树木、山石、花卉相隔。婴孩或穿肚兜，或穿宽衣肥裤，嬉戏玩耍，天真可爱。

以儿童游戏为装饰题材称为“婴戏图”，是瓷器装饰的典型纹样之一。婴戏图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瓷器。清代瓷器上出现婴戏图，缘于清代康熙朝社会稳定、人口增长较快的社会背景。婴戏图成为民间艺术中常见画面，并使宫廷艺术品受到影响。同治、光绪时期婴戏图也多见。